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艺术家大随笔:影视艺术家卷/中国艺术家大随笔编委会编. - 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8.9

ISBN 7-80641-140-2

I. 中… II. 中…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7350 号

中国艺术家大随笔

影视艺术家卷

编著 中国艺术家大随笔编辑委员会

责任编辑 王丹 吴丹青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338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80641-140-2/I·007 定价:28.00 元

目录

序 言	1
夏 衍	旧家的火葬.....	1
	草木鱼虫之类.....	4
	风雨故人情.....	6
	赞颂我的“老大姐”.....	11
	于伶小论.....	14
田 汉	《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	23
	《三个摩登女性》与阮玲玉.....	26
	《民族生存》与艺华公司.....	32
梅兰芳	我的电影生活.....	37
陈荒煤	她第一个向我打开了文学之门.....	44
柯 灵	故园春.....	51
	回看血泪相和流.....	55
赵 丹	第一次演戏.....	65
	宝刀.....	71
王人美	艺坛生活漫忆.....	75

舒绣文 汤晓丹	最后的文字	94
	难忘的关怀	108
蓝天野 钟惦斐	上海,陌生的世界	116
	乱世香港	124
	山城的雾	130
	寻觅失去的青春	137
	人的价值	151
黄宗江	白云下面是故乡	159
	回延安唱歌	164
	故乡的清明节	168
	从天心函到延安	173
	孙道临是一首诗	180
黄宗英	能不忆青岛	187
	陋室珍壁录	191
	人生与艺术	200
	黄宗英大礼谢饭	202
秦 怡	俺来家啦	206
	西康行	214
	金焰与我	223
田 华 张瑞芳	流年往事录	241
	江村和《北京人》	255
于 蓝 李婉芬 叶 楠	我和阿丹的最后一次见面	260
	赵丹同志,深深地怀念你	264
	拾起心中的落叶	269
白 桦	在西勒特其山野间的日子	296
	无梦时节	307
	我是一个欢乐而醉的饮者	310

	悲情之旅·····	313
	景以文名·····	315
	放河灯·····	317
王铁成	我演周恩来的台前幕后·····	320
沙叶新	我的“饲养员”·····	329
	“我曾是·····是个结巴”·····	332
刘晓庆	说女人·····	335
潘虹	一个人的节日·····	342
方青卓	我在寻找那颗星·····	346
	樱花梦·····	350
	写在大三巴上的日记·····	357
斯琴高娃	点点心得·····	366
凌子风	我的艺术梦·····	371
金山	《夜半歌声》带给我的回忆·····	381
白杨	风雨晴时君不见·····	385
司徒慧敏	延安影事·····	391
谢晋	我眼里的日本·····	396
李准	我怎样写《老兵新传》·····	402
袁文殊	访影城好莱坞杂感·····	415

旧家的火葬

夏衍



半个月前，接到妻从上海寄来的信，说六月一日游击队打到杭州近郊，把我们的旧家放火烧了，因为那屋子被敌伪占领了之后，开了一所很大的茧厂，所以除屋子全烧之外，还烧毁了敌人已经收买了的几十万元的茧子。妻在后附加着说：“我们觉得很痛快……”

在将信将疑中，昨天深夜看见了中央社金华发的一个电报：“浙东我某部，于五月三十一日晚潜入杭垣，当在太平门外与敌发生激战，毙敌甚多，并将敌仓库多所及安利、正大两茧行全部焚毁，一时烈火熊熊，火光烛天，城内秩序大乱，是役敌除死伤外，损失三百万元以上。”

消息是证实了，正大茧行就是我的故居，我出生的旧家，竟在这样的情形下火葬了。和妻子一样，我也只能喊出了一句痛快。

四十年前我出生在这古旧的大屋子里。那

是一所五开间,而又有七进深的庄院。地点是在杭县太平门外严家街,离城三里。这屋子造于洪杨之前,所以一切都是老派。我懂得人事的时候,我们的家是凋落了,全家人不到十口,但是这一百年前造的屋子,说得毫不夸张,至少可住五百人以上。经过了洪杨之劫,许多雕花的窗棂之类是破损了,便是合抱的大圆柱,可以做一个网球场的大天井,依旧夸示着它昔日的面貌。我在这破旧而大得不得体的旧家,度过了十五个年头。辛亥革命之后,我的哥哥因为穷困,几次要把这屋子卖掉,但是在那时候竟找不着一个能够买下这大屋子的买主。哥哥瞒了母亲,从城里带一个人来估看,我只听见他们来回讨价还价,一会儿笑一会儿争之后,哥哥愤愤地说:“单卖这几千块尺半方的大方砖和五百几十块青石板,也非三千块钱不可!”

我才知道了这些日常在那里翻掘起来捉灰螿虫的方砖,也是这样值钱的东西。

据母亲说,这屋子是我们祖上“全盛时代”在乡下建造了而不用“别邸”;本家住在艮山门内的骆驼桥,这是每年春秋两季下乡祭祖时候用的临时公馆。出太平门不远,就可以望见这座大屋子的高墙,那高得可怕的粉墙,将里面住的“书香子弟”和外面矮屋子里的老百姓分开,所以不认识的人,只要一问沈家,那一带的人立刻就会知道:“啊,墙里。”“墙里”变成了太平门外沈家的代名,据说已经是近百年以来的事。

但是,辛亥革命前后,我们的家衰落到无法生存的田地,这屋子周围的田地、池塘,都渐渐地给哥哥押卖了,只有这屋子,却因为母亲的反对,而保留着它破旧得像古庙一般的形态,夏天的黄昏会从蛀烂了的楼板里飞出成千成万的白蚁,没人住的空屋子也会白昼走出狐狸和鼯鼠。但是,墙里和墙外的差分,却因为“墙里”人的日益穷困,而渐渐地撤废了,墙外的孩子们也做了我的朋友,我记忆中也还鲜明地保留着一幅冬天自己拿了篮子到乡间去拾枯柴的

图画。

假如我母亲还在世，今年已经是八十三岁了，在那个时代里，她算得是一个性格奇特的人，四十五岁死了我父亲之后，从没念过一句佛，从没烧过一次香，出嫁了的姊姊送她一串念珠，她却丢在抽斗里从来不去理会，不佞佛，当然不信耶稣。反对中医，有什么毛病专服西药。从这种性格推衍开去，她是一个富于民主精神的人。她从不讨厌邻近的穷孩子到我家里来，也从不禁止我和这些野孩子们在一起；把自己吃用的东西省下来送给邻近的穷人，是她惟一的愉悦。我长大了之后从日本或者上海回来，总带给她一点糖果和食品；但是她自己并不吃，瞒着我们偷偷地送给那些终年赤脚的孩子。被我们看见的时候，她说：“我们吃得多了，这种东西，也许他们是一生也不会吃到的。”

但是，具有这种近代性格的人，对于这所古旧的屋子，她却怀着使人不能相信一般的留恋与执著。我中学毕业的那一年她郑重地对我说：“趁我活着，把这屋子分了吧，我一死，迟早会给你哥哥卖掉的。”

当时是“五四”之后，我根本就对这象征封建的“破庙”有反感，所以我对于她苦心地保守了几十年的财产简直不加任何的考虑，随口地说：“我不要，让他卖去！”这句话伤了她的心，背着人哭泣了一整日，我也就从这时候离了“家”。“旧家”的影子在记忆里渐渐地淡忘了，一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的初夏，接到母亲病笃而赶回到这屋子的时候。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旧家也有了几度的沧桑。那一次欧战之后，因为民族工业的勃兴，我哥哥也在这封建的屋子里开过一个现代式的工厂。用新式的“机子”织杭纺，在“城外”这屋子算是第一所“工场”。浙江丝织业凋落了之后，“机子”停止了工作，是这屋子在五年前又变了“正大茧厂”。那一年，因为哥哥要把母亲卧房侧面的“果园”改作屯茧的仓库，要把“果园”的枣树和橘子树斫掉，他

们之间曾引起过一次很大的冲突，结果母亲失败了。我最后一次回家的时候，青葱的枣树园已经变了煞风景的“茧灶”了。我虽则不曾亲耳听见丁丁的伐木声音，但是，“樱桃园”最后一场的主人公们的心境，我是感受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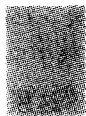
在斗争剧烈的时候，我屡次感觉到潜伏在我意识深处的一种要将我拖留在一个阶段的力量。我挣扎，我残忍地斫伐过我自己的过失，廉价的人道主义，犬儒式的洁癖，对于残酷的斗争的忌避，这都是使我回想到那旧家又要使我恼怒于自己的事情。而现在，一把火把象征着我意识底层之潜在力量的东西，完全地火葬了，将隔离了穷人和书香人家的墙，在烈火中烧毁了。

我感到痛快，我感觉到一种摆脱了牵制一般的欢欣。

1939.7.13

草木鱼虫之类

夏衍



逛公园，背着手在看新出土的芍药。对面草地上，一群红领巾在听他们的老师讲蚯蚓的故事。这情景勾起了我童年的回忆，也联想到

另外一些事情。

在我小的时候,只知道蚯蚓是一种最好的鱼饵,至于蚯蚓的生态、对土壤和农作物的作用,那是直到大学毕业,开始杂览的时候才知道的。我生在乡间,父亲懂一点医道,家里有本草之类的医书,所以对于草木鱼虫之属,自以为还不是没有常识,可是后来读到英国人吉尔勃·怀德所著的《色尔彭自然史》,才使我吃了一惊,原来过去深信不疑的知识,有些竟是十分荒诞的。不仅“腐草化为萤”没有科学依据。“螟蛉有子,螺蛳负之”也不过是有趣的传说。这位业余生物学家所写的《色尔彭自然史》,的确在一个不短的时期使我着了迷。由于读了这本书,所以后来再读法布尔的《昆虫记》,就觉得对这一类自然现象有了一些基础知识,不像初读《自然史》时那样的事事使我瞠目惊异了。

读《色尔彭自然史》和《昆虫记》,除了可以得到许多自然界、生物界的常识之外,对我最有启发的,还是这些书的作者们的那种不泥旧说、不逞臆想,事事都从实际观察出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怀德生于1720年,他的职业是伦敦附近色尔彭教区的一个助理牧师,他凭自己的兴趣,穷年累月地对色尔彭地区的自然现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他把观察所得准确地记录下来,偶有所得、或者遇到难以理解的问题,就向远方的两位生物学家报告和讨教,《色尔彭自然史》就是这些来往书信的汇编。由于他的文笔清新,内容引人入胜,所以两个世纪以来,这本书一直是为人传诵的英国散文名著。

我们中国并不是没有这种对自然现象有兴趣的热心家,记载这种自然现象的书籍,也着实不少。从《尔雅》、《花镜》、《百廿虫吟》、《南方草木状》一直到《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书着实不少,可是从科学的准确性来要求,有不少书就很难说了。由于此,“雀入大海为蛤”、“腐草化为萤”,就成了过去许多人的常识。应该肯定李时珍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他的《本草纲目》基本上都是经

过实物观察的。可是就拿“腐草化为萤”为例，他还是深信而不疑的。他说：“萤有三种：一种小而宵飞，腹下光明，乃茅根所化也，吕氏月令所谓腐草化为萤者是也；一种长如蛆蠅，俗名萤蛆，明堂月令所谓腐草化为蠅者是也，其名宵行。”其实，读一读《昆虫记》就可以知道，萤是卵生的，所谓两种或者三种，有翼或无翼，只不过是雌雄形态有异而已。法布尔为了观察一种昆虫的生态，常常穷年累月，或者忍饥受寒，彻夜不寐，他的那种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精神，读其书者无不深为感动。譬如他观察所得的萤吃蜗牛的故事，实在是一篇既生动又有趣的科学小品。

我不知道《色尔彭自然史》有没有中译本，《昆虫记》也只有一本1933年出版的，经过两道译述的中文本。为了让儿童和成人有一些自然科学的常识，我觉得这一类书的译述，是十分必要的。

风雨故人情

——《廖沫沙的风雨岁月》代序

夏衍



读陈海云、司徒伟智的《廖沫沙的风雨岁月》，许多往事涌上心来，感慨万千，竟日不能自制。

时光流逝，从二十年代后期到现在，半个多

世纪过去了。这是一个雨雪交加的年代，这又是一个晨光初展的年代；这是一个腥风血雨的年代，这又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年代，这又是一个积习难移的年代。为了推翻三座大山，为了民族和人类的自由解放，无数仁人志士，无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付出了血、泪和生命的代价，前仆后继，九死无悔地经历了这一漫长而艰险的路程。在这一代勇敢而缺乏斗争经验的知识分子中，廖沫沙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才华出众的杂文家和新闻工作者。他顽强地斗争了半个多世纪，他也被贫穷、疾病、“左”风折磨了半个多世纪。

1933年，我在上海田汉同志家里认识了他。当时他还是二十刚出头的青年，我知道他是“左联”盟员，知道他经常在报刊上写稿。由于当时我在电影界工作，和他相知不深，也没有工作上的联系，所以他在《申报·自由谈》上写了一篇杂文而“惹了一场大祸”的事，也全不知道。在那个夜色如磐的日子里，即使在同志之间，也是很少谈到私事的，所以他的家世、阅历，乃至参加“飞行集会”而被捕等等，我也一无所知。直到1939年他参加了桂林《救亡日报》，从田汉和周立波同志的介绍才知道了一点他入党前后的经历。他给《救亡日报》写了许多文章，杂文、政论、小品，什么都写，而且写得很好，很有文采。《救亡日报》是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全社只有二十几个人，大部分都是青年作家，其中有林林、司马文森、周钢鸣、华嘉、陈紫秋等等，他们都能写，也写得很多。但那时是“书生办报”，能写政论的人不多，所以这张报上的社论、时事述评、今日话题之类，几乎都由我一个人“包办”了。沫沙来了，我就有了依靠。当桂林的话剧团逼着我写剧本、和到香港去为《救亡日报》筹款时，我就很放心地请他代笔。这时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吃惊，他写的几篇军事论文忽然被黄琪翔将军看中了，一定要请他去当少校秘书，到前线去工作了半年多。当然，他和我一样，在战争时期办报，只不过是读了一点《孙子兵法》和克劳塞维支

的《战争论》之类，写一点“纸上谈兵”的政论而已。但从这件事也可以说明，他中国文学的根底扎实，读书联系实际。当时才三十七岁的廖沫沙，已经不只是一个作家、杂文家，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党的宣传工作者了。

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不算太久，第一次是1939年到1941年在桂林《救亡日报》，第二次是1941年在香港《华商报》，第三次是1946年到1949年一起在香港工作。在桂林，我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个人间接触较多，不知不觉地就成了知音和知心的朋友。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他多才多艺，文采斐然；作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他诚实皎洁，平易旷达，特别是他的那种任劳任怨、无私无畏、从不考虑到个人的得失的品格。

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提到过长沙《抗战日报》的“一位同事因为家里生活困难而发生了一件母子自杀的悲剧”，这里所说的“母子”就是沫沙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孩子。“这一悲惨事件给沫沙的心灵和身体以极深的创伤，很久还不能排遣”，但是他在《救亡日报》时期，却从没谈到过这场悲剧。他真的是化悲痛为力量，依旧是勤奋地工作，笔不停挥，写了大量的杂文和政论。《救亡日报》是一个青年人的群体，我年纪最大，也不过四十岁，睡地铺，吃大锅饭，大家都“国尔忘家”。这正如这本书中所说：“报社的工作是繁忙的，生活是清苦的。但是，惟有在这里，他才感到是朝气蓬勃，精神焕发，重新感到自己与整个革命事业连成一体。”1941年元旦，他在《救亡日报》白面山的印刷厂奋笔写了一副春联：“大块文章救中国，一行消息报新春”。可是新春之后，却迎来了一场风暴，“皖南事变”爆发了。由于我们拒绝登载中央社发的那条诬蔑新四军的消息，国民党肯定要对《救亡日报》下毒手了，南方局决定要我尽快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我就把《救亡日报》被禁后的一切善后事宜交给了沫沙、林林和张敏思，于除夕那一天离开了桂林。他们临危不惧，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大量的善后疏散

工作。直到3月初报社正式被封之后，才率领了二十几位社员，分头经广州湾到了香港。

按照南方分局和廖承志同志的安排，我们很快创办了香港《华商报》，林林和张敏思去了菲律宾，沫沙则留在香港，担任了《华商报》的编辑主任。和战时的内地比，香港可以说是一个浮华世界。但是，沫沙是一个内向的人，在香港他除了写作，就是读书，既不游山玩水，也不看电影、戏剧。偶尔忙里偷闲，我约他和胡希明、乔冠华到《华商报》附近的一家北方餐馆“海景楼”去喝几杯酒。他酒量不大，我更是滴酒不沾，而乔胡两位却都是酒豪。所以在这种场合，他和我也只是敬陪末座，默默地欣赏他们的酒后狂言而已。

1941年的《华商报》只办了八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们再一次在战乱中分手。他和韬奋、茅盾、胡绳等经东江游击区，我则和金仲华、蔡楚生等经澳门、台山，于1942年四五月间先后回到重庆。

我办了五六年报，对新闻工作发生了兴趣。所以回到重庆，就希望能在《新华日报》工作。可是恩来同志却说：“你可以在《新华日报》上写文章，但主要的还是要以公开合法的身份，搞上层和文化界的统战工作。”而沫沙一到重庆，恩来同志就让他进了《新华日报》。直到1944年冬，我搬到化龙桥接替章汉夫的工作，才又有见面的机会。四十年代中后期，是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时刻，抗日战争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三年解放战争，我和他有时天各一方，有时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但大家都忙，很少有静下来谈心的机会。我和他都在《华商报》、《群众》和其他刊物大写政论、杂文，每天都写，笔不停挥，自己也觉得写得非常欢畅。在数量上他写的不比我多，但他除了杂文、政论之外，还写了几篇很出色的“故事新编”，如《陈胜起义》、《鹿马传》、《曹操剖柑》等等。1949年4月，我离开香港回到北平，随军南下迎接上海解放，我们又分别了五年。1955年我调到文化部，这时候他在北京市委。“隔行如隔山”，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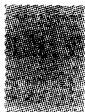
在北京,相聚的机会也不多,但他的文章,不论用的是什么笔名,我还是一看就知道的。十年浩劫中,“四人帮”之流常常骂我们这些人“心有灵犀一点通”,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奋斗、而工作,心心相印,这一点倒是说对了的。

我在文化部管电影和外事工作,也偶尔写一些杂文随笔之类,但和以前比,可以说写的少得多了。1962年《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陈笑雨同志来访,说他们要辟一个杂文专栏,目的是“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进知识”,并说这个专栏叫《长短录》,是沫沙拟定的。于是我欣然地“入了伙”,前后写了六七篇。当时,正在“三年困难时期”,报刊上的文风很坏,假大空、党八股猖獗,特别是1957年之后不断地批斗知识分子,“知识越多越反动”之说开始抬头,使我更感到愚昧无知不仅是建设之大敌、文明之大敌,而且是民主法制的大敌。我不察世风,不自量力,又想用杂文这一武器,来做一点匡正时弊、增进知识的工作。结果呢,谁也想不到,这个有沫沙参加的《长短录》后来竟被说成是与《三家村札记》齐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当然,沫沙是“三家村”中的一家,又写过一篇《有鬼无害论》,惹了一场大祸,遭受了八九年的牢狱之灾。往者已矣,这些事说来伤心,不多讲了。

我和他前后一起工作了半个世纪,可以说是风雨同舟。“少年子弟江湖老”,沫沙也已经快八十岁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这些人居然大难不死,终于看到了大地春回,得到了为振兴中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勉尽微力的机会。我十分高兴地看到《廖沫沙的风雨岁月》的出版,祝愿他老当益壮,继续用他的如椽之笔,为建设物质和精神文明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赞颂我的“老大姐”

夏 衍



冰心同志和我同庚，都出生于1900年秋季，但她比我大二十天，所以她一直叫我“小老弟”。这样，我也相应地叫她“老大姐”。

我认识她是在全国解放之后，但很早之前就读过她的作品。我曾两次和她一起出国，一次去印度，一次去埃及，每次一到我们的大使馆，从大使、参赞，到工作人员，大部分也都说：“我在小学念书时就读过您的《寄小读者》。”这不是恭维，而是她辛勤劳动的成果。试想一下，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漫长而动乱的六十年，她笔不停挥，全心全意地为儿童和青少年服务，单就这一点，在中国文艺界已经够得上说难能可贵的了；更使人惊奇的是在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垮台之后，她已经年逾古稀，除了担任了人大、文联、妇联等等许多繁重的社会活动之外，在1979、1980年，还连续获得了最佳短篇小说

奖。我不想用“人瑞”这个带封建性的字眼,但是这样永远年轻、不知疲倦的文艺工作者,不论中国外国,总是为数不多的吧。

认真、谦逊、勤奋、顽强……这些都是她的特点。可是就在顽强这一点上,真有点使我既钦佩而又担心。她八十岁的那一年夏天,患了一次小中风,右半身偏瘫了。她以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精神配合治疗,战胜了这场疾病。那年秋天我和巴金同志一起去看她,真是一个奇迹,她的病已经好了百分之九十,不仅能走,能讲——讲得很流利,而且还能用右手写文章,特别是我们去探望她时,她有点兴奋,也可能是自己“炫耀”吧,她特别表现得动作敏捷。当时巴金和我都劝她要服老、节劳。当然,她表面上接受了我们的劝告,可是她仍是辛勤地劳动,不久,她又摔了一跤,跌断了左胯骨。我自己,也是在“文革”中折断了胯骨的。1976年我到上海诊视,一位热心的医生劝我做手术,我正深为行动不便而感到苦恼,于是就同意了医生的建议。可是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罗瑞卿同志因腿部做手术而逝世的消息,于是组织上和朋友们都劝我不要“冒险”,因此便放弃了做手术的念头。但冰心同志却比我顽强得多了。她一进医院,就不顾她老伴和儿女们的劝说,坚决主张开刀。结果是“吉人天相”,当我再次到医院去看她的时候,她居然又迅速康复,准备出院了!八十一岁的人能有这样坚强的意志,实在是太令人敬佩了。

除了上面谈到她的特点之外,我还应该加上渊博和机智。由于她的天禀和勤奋,她不仅是文艺上的全才,而且是一个难得的社会活动家,特别是她在对外活动方面的成就。她博古通今,英语讲得很流利。记得1953年我和她一起参加以丁西林同志为团长的中印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在那次活动中她这方面的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有一次,我们访问泰戈尔的故居,在欢迎的茶会上,因为她翻译过泰戈尔的作品,所以丁老和我都推她即席讲话。她先用英语背诵了两首泰戈尔的诗,然后简洁地介绍了泰戈尔对中国的

友谊和他在中国的影响。另一次是我们在尼赫鲁官邸吃午餐，席间冰心同志和尼赫鲁的女儿、现任印度总理甘地夫人的谈话，使我这个干了多年外事工作的人感到佩服。她那种不亢不卑，既有幽默，又有节制的风度，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文艺队伍中，可以说很少有人可以和她比拟的。

当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正是中国革命文坛的巨匠茅盾同志去世不久。郭老去世之后，文艺界出生于十九世纪的人已经不多了，值得庆幸的是八十六岁高龄的圣陶同志和我的这位老大姐还是精神抖擞地挥舞他们的彩笔。经过长期的内战外战，数不清的运动，特别是空前而一定会“绝后”的十年浩劫之后，为我国三亿儿童服务的作家实在太少了。儿童读物、歌曲、戏剧、电影实在太少了。为此，我衷心地再一次劝告我的老大姐能在两次大病之后，带病延年，节劳服老，再为少年儿童们服务十年、二十年，一直服务到二十一世纪。

1981年初夏于北京